

# “唯用一好心”精神的现代价值

罗本森

“好心精神”并非抽象的道德符号，其文化源头可追溯至南北朝至隋朝时期的洗夫人，她以“和合百越、护境安民”的责任情怀一脉相承。从社会维度看，好心精神是化解社会矛盾、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纽带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利益分配的差异、公共事务的复杂，难免会引发社会矛盾与信任隔阂，而洗夫人好心精神所蕴含的“包容”“公正”“互助”理念，是破解这些问题的关键。其一，好心精神能修复社会信任。近年来，“老人摔倒扶不扶”“邻里纠纷难调解”等问题，本质上是社会信任缺失的体现，而源于洗夫人的好心精神普及，能让“善意”成为社会共识——当更多人主动践行好心，比如商家诚信经营不欺客、市民遵守规则不越界、社区居民互帮互助暖人心，就能逐步打破“人人自危”的信任壁垒，构建起“人人向善、人人受益”的社会生态，这与洗夫人“和合百越”、化解族群矛盾的智慧高度契合；其二，好心精神能助力基层治理。基层治理的核心是“以人为本”，而好心精神与这一核心深度契合。在社区治理中，党员干部带着“为居民解难题”的好心，主动倾听群众诉求，解决民生痛点，能减少干群矛盾；在乡村治理中，村民秉持“互帮互助”的好心，参与乡村建设，化解邻里矛盾，能凝聚治理合力。可以说，好心精神就像“润滑剂”，能让社会治理从“被动管理”转向“主动服务”，从“矛盾化解”转向“源头预防”，为和谐社会建设筑牢基础，是洗夫人治理智慧在现代社会的生动延续。

从个人维度看，好心精神是现代公民涵养健全人格、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锚点。在快节奏、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，“精致利己”“功利至上”的心态容易引发个体的精神内耗与人际关系疏离，而洗夫人“唯用一好心”所倡导的“善意”与“担当”，恰好为个体提供了对抗精神空虚的价值坐标。一方面，好心精神能培育公民的共情能力，让个体在人际交往中主动关注他人需求——无论是日常里为陌生人提供的微小帮助，还是疫情防控期间志愿者自发参与的物资配送，本质上都是“好心”从历史走向现实的微观实践，这种实践既能缓解他人困境，也能让个体在“被需要”中获得精神满足，构建起健康的人际关系；另一方面，好心精神能激发个体的责任意识，推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。从科研工作者扎根实验室攻克技术难题，到基层教师坚守山区点亮教育希望，再到普通劳动者在岗位上精益求精，这些行为的背后，都藏着“为他人谋幸福、为社会做贡献”的

好心底色，而这种底色，正是个体实现人生价值的核心支撑，与洗夫人“护境安民”的责任情怀一脉相承。从社会维度看，好心精神是化解社会矛盾、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纽带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利益分配的差异、公共事务的复杂，难免会引发社会矛盾与信任隔阂，而洗夫人好心精神所蕴含的“包容”“公正”“互助”理念，是破解这些问题的关键。其一，好心精神能修复社会信任。近年来，“老人摔倒扶不扶”“邻里纠纷难调解”等问题，本质上是社会信任缺失的体现，而源于洗夫人的好心精神普及，能让“善意”成为社会共识——当更多人主动践行好心，比如商家诚信经营不欺客、市民遵守规则不越界、社区居民互帮互助暖人心，就能逐步打破“人人自危”的信任壁垒，构建起“人人向善、人人受益”的社会生态，这与洗夫人“和合百越”、化解族群矛盾的智慧高度契合；其二，好心精神能助力基层治理。基层治理的核心是“以人为本”，而好心精神与这一核心深度契合。在社区治理中，党员干部带着“为居民解难题”的好心，主动倾听群众诉求，解决民生痛点，能减少干群矛盾；在乡村治理中，村民秉持“互帮互助”的好心，参与乡村建设，化解邻里矛盾，能凝聚治理合力。可以说，好心精神就像“润滑剂”，能让社会治理从“被动管理”转向“主动服务”，从“矛盾化解”转向“源头预防”，为和谐社会建设筑牢基础，是洗夫人治理智慧在现代社会的生动延续。

从国家维度看，好心精神是传承优秀文化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。一方面，以洗夫人理念为源头的好心精神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。“仁者爱人”“民为邦本”等传统理念，与洗夫人“唯用一好心”的精神相互滋养，而在现代社会，好心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——比如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

想，本质上就是好心精神在国家治理中的集中体现；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理念，更是将“好心”从国内延伸到国际，体现了中国“为世界谋大同”的大国担当。传承和践行好心精神，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机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；另一方面，好心精神能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注入力量。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经济的增长，更需要精神的支撑。在科技创新领域，好心精神推动科研工作者以“为国争光”为己任，突破“卡脖子”技术；在乡村振兴领域，好心精神激励干部群众以“为家乡谋发展”为目标，推动产业振兴、文化振兴；在生态文明领域，好心精神引导社会各界以“为后代留福祉”为追求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。可以说，好心精神所凝聚的精神力量，能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的物质力量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支撑，是洗夫人“护国安邦”精神在新时代的升华。

当然，践行洗夫人的好心精神，也需要社会为“好心”提供保障。一方面，要通过宣传教育，让好心精神融入校园教育、社会宣传的全过程，比如在中小学开展“传承洗夫人好心精神”主题活动，在媒体平台宣传“好心人”事迹，让好心精神成为全民共识；另一方面，要建立“好人有好报”的保障机制，通过完善见义勇为奖励制度、健全好人权益保障政策，避免“好心没好报”的现象，让更多人敢于践行好心、乐于践行好心，让洗夫人的“好心”精神在现代社会持续传递。

综上，洗夫人“唯用一好心”的好心精神，不是停留在过去的道德遗产，而是适配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财富。在个人层面，它是健全人格的“养分”；在社会层面，它是和谐稳定的“纽带”；在国家层面，它是发展进步的“动力”。唯有让好心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承、落地生根，才能凝聚起向上向善的强大力量，促进个人幸福、社会和谐和国家繁荣。

# 依托资源优势 推动沉香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

杨寿锋

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要求“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”，提出要“支持发展绿色高效种养，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，培育农业精品品牌，促进全产业链开发”。这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。茂名特色农业资源禀赋优越，特别是“五棵树”之一的沉香树种植在各市县区均“榜上有名”。目前沉香产业的发展在精深加工、品牌培育、全产业链条开发等方面都在不断实现突破。

但是，当前茂名沉香产业发展也存在需要攻克的难题。一是市场拓展不力。茂名沉香经营者对本地沉香产业发展优势认识不清、定位模糊，缺乏远景规划目标，且利益联结机制缺位。二是监管不足。在产业加工与市场流通方面，鱼龙混杂，监管不到位，未有效树立起茂名沉香的品牌，且沉香产品市场流转自由化程度高，长期存在竞争无序的现象。三是内部协作不够。茂名市域内各地在沉香产业市场培育上单打独斗，在产业链上下游缺少协作，优势互补不足。

为促进茂名沉香产业高质量发展，亟待在市域层面高位推动，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，明晰发展方向，规范经营秩序，推动行业稳健发展。因此笔者建议：

要加强引领，凝聚最大合力。在思想认识上要提高站位，压实责任，将发展茂名沉香特色产业作为当前以至今后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。一是相关部门要对茂名沉香产业发展情况开展“深调研”，强化政策引领，并做好“真落实”，做到“底子清、情况明、计可行”，坚定信心，持之以恒树好沉香这棵树，用心用情用力打造“世界香都”。二是积极探索建立支持沉香产业发展的市场化多元化投资体制机制，发挥公共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，鼓励社会资本按市场化方式投资沉香产业。设立沉香产业发展基金，落实沉香树良种良苗补贴和结香补贴，引导在宜香宜林的乡镇扩大沉香种植，培育市场，强化沉香产业发展保障。三是加

强协作，强化电白与化州等兄弟县区的产业联动，全市一盘棋，整体推进茂名沉香产业发展。

要因地制宜，打造最佳品质。应立足茂名发展沉香产业所需的土地资源特点，加强市场研判，做到基础上扩容、市场上培育、服务上提质。尊重沉香生长规律，鼓励部分企业和种植户坚持品质育香，打破人工干预五年速成取香的运作，适当延长沉香树的结香周期，打造高质量沉香产品。坚持绿色发展路线，打造“沉香+”，解决“大家小圈”及自由市场内动力不足问题。结合乡村旅游和文旅康养项目，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，打造“驿路香站”“周末香会”“好心香礼”“好心香缘”等“信字号”文创产品，抢占市场先机。要注重培养工匠精神，打造品牌。秉持“产业立香、工业强香、商业活香”的发展理念，着眼世界香市，专注茂名特色，以沉香产业基地为依托、以重大项目为载体，构建茂名沉香现代产业体系。

要强化监管，营造最优环境。沉香种植多年来属于政府大力扶持的对象之一，但在加工与销售过程中曾出现过哄炒、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等短视、投机行为。要深刻吸取“9.14”事件的教训，加强茂名市沉香制品市场秩序整治工作。农业、市场监管、财税部门要落实主体责任，规范从沉香种植、成品收购、加工上市各环节、全流程的监管和服务。重点在促进沉香产业结构调整，扶持上游、发展中游、带动下流，加大对沉香产业的政策引导和金融扶持。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，优化沉香产品供给体系，畅通产品流通循环，使原材料供应、产品加工、产品销售的链式资源配置更加合理高效，实现产品提质、企业增值、农民增收、社会效益，推动茂名沉香产业行稳致远、健康发展。

(本文系茂名市党校系统课题《茂名沉香史考及产业化建议》(课题编号2025-mmdxkt-17)研究成果)

# 长安风骨 诗坛脊梁

——浅析刘禹锡的傲骨精神

杨绍精

长安，作为大唐之帝都，不仅是政治权力的中枢，更是文化精神的熔炉。这座都城见证了“贞观之治”的雍容、“开元盛世”的繁华，亦亲历了安史之乱的惨痛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，孕育了无数文人墨客的理想与悲歌。而在这群星璀璨的谱系中，刘禹锡以其独树一帜的傲骨，在长安的宫墙内外、在贬谪的江湖之远，书写了一段跨越千年仍令人动容的精神传奇。他的傲骨，不是恃才傲物的孤高，不是愤世嫉俗的偏激，而是植根于儒家家国情怀的坚守，熔铸于道家超然气度的通透，最终沉淀为中国文人精神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。

一、始入长安，傲骨初显形

大唐贞元九年，二十二岁的刘禹锡怀着“少年负志气，信道不从时”的豪情，踏入了长安的城门。彼时的大唐，虽已不复开元盛世的巅峰气象，但贞元年间的休养生息，仍让帝都保留着几分雍容华贵的底色。朱雀大街上车水马龙，东西两市人声鼎沸，大明宫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这一切都让年轻的刘禹锡心潮澎湃。他出身儒学世家，自幼饱读诗书，“弱冠游成京，上书金马门”，凭借着过人的才学，顺利通过科举考试，登进士第，又登博学宏词科，开启了仕途生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博学宏词科考试中作《平权赋》，以“上则取象于天，下则取法于地”的宏大格局，主张“权轻重而不差，衡衡铢而必正”，不仅展现了扎实的经世致用之学，更暗藏着对政治清明、法度公正的追求，这份少年意气中的原则性，正是其傲骨的最初萌芽。

初入官场的刘禹锡，如同初升的朝阳，锋芒毕露却又心怀赤诚。他被授太子校书郎，后迁监察御史，与柳宗元、韩愈、韦执谊等志同道合之士结交，形成了以改革为核心的政治群体。他们常于长安慈恩寺、曲江池畔聚会，“论思献纳，多以天下为己任”。据《旧唐书·刘禹锡传》记载，某次朝堂议事，宦官俱文珍擅权干预政务，众臣皆缄默不语，唯有刘禹锡挺身而出，直言“宦者不得干预朝政，乃祖宗之法，岂可废乎”，言辞铿锵，令俱文珍面红耳赤。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，正是其傲骨在政治场域的直接显现。他与柳宗元等人共同草拟的《国子监业园造像碑》，盛赞阳城“抗直不挠，犯颜谏诤”的品格，实则也是在不标榜自身的政治追求——不慕权贵，坚守正道。

在长安的最初岁月，刘禹锡的傲骨体现在他对政治理想的坚定追求上。他积极投身于王叔文领导的“永贞革新”，成为改革派的核心智囊。革新期间，他提出“罢官市、禁五坊小儿”的举措，直指宦官压榨百姓的弊政；又主张“收夺宦官兵权，加强中央集权”，试图化解大历的统治危机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刘禹锡曾深夜草拟《请罢兵状》，力谏唐顺宗停止对藩镇的无意义征伐，文中“兵者，凶器也，不可轻用；民者，邦本也，不可不恤”的字句，字字千钧，既展现了他的政治远见，更体现了他为民请命的担当。这种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的执着，让他在改革浪潮中赢得了“刘舍人”的美誉，也让他成为保守派的“眼中钉、肉中刺”。他在《学院秋中三首》中写道：“朔风悲老骥，秋霜动鸷禽。出门有远道，平野多层阴。深飞绝塞，振迅拂华林。不因感衰节，安能激壮心？”诗句中，老骥伏枥的悲壮与鸷禽振翅的勇猛交织，既展现了他对未来的无限憧憬，也暗藏着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高。

二、贬谪途中，傲骨愈坚韧

然而，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往往充满了残酷。“永贞革新”仅持续了一百四十六天便宣告失败，宦官与保守派联手发动宫廷政变，朝立唐宪宗即位，改革派成员纷纷遭贬。刘禹锡作为改革的核心人物之一，被贬为朗州司马，开启了长达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涯。长安的繁华渐行渐远，宫墙的朱红化作了江湖的青黛，曾经的凌云壮志一朝落空，在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，这种巨大的落差，足以让许多人一蹶不振。但刘禹锡不同，风雨的洗礼不仅没有磨灭他的傲骨，反而让其愈发坚韧，在每一处贬谪之地，都留下了他坚守气节、为民请命的印记。

刘禹锡抵达朗州后，他身处“地偏人稀，蛮夷杂处”的偏远之地，生活困顿，政治上备受监视，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。朗州百姓深受巫风陋习之苦，每逢祭祀便宰杀牲畜，耗费巨资，刘禹锡见状，不仅写下《蛮子歌》《竞渡曲》等诗，以民俗为载体宣扬教化，更亲自劝说当地官吏废除陋习，推广农耕。据《新唐书·刘禹锡传》记载，他在朗州期间“修堤堰，兴水利，教民耕作”，让当地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。这种即便身处逆境，也依然心系民生、为民请命的傲骨，正是其傲骨有温度——它不是脱离现实的孤高，而是扎根大地的坚守。

在朗州的十年间，刘禹锡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第一个高峰，他的傲骨在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他在《秋词二首》中写道：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打破了自古以来文人悲秋的传统，以秋日晴空下振翅高飞的仙鹤自比，展现了即便身处逆境，也依然要搏击长空、傲视群雄的傲骨。更令人动容的是他的《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》：“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当时，他奉召重返长安，本有机会重新跻身朝堂，却因这首再获罪。诗中的“桃千树”暗指那些在他贬谪后投机钻营、依附权贵的新贵，“刘郎”则是他对自己的自称，短短四句，辛辣地讽刺了保守派的得意忘形，展现了他即便历经十年贬谪，也依然敢于针砭时弊、蔑视权贵的勇气。果不其然，这首诗传到了宪宗耳中，龙颜大怒，刘禹锡再次被贬，这次的目的地是更为偏远的连州。

在连州刺史任上，刘禹锡的傲骨体现在他对教育的重视与对民生的关怀上。当时的连州“文化闭塞，百姓蒙昧”，他下车伊始便创办了“海阳书院”，亲自讲学授徒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，其中包括后来考中进士的周敦颐之父周辅成。他在《连州刺史厅壁记》中写道：“夫吏者，民之师也，非以陵民也；民者，吏之本也，非以奉吏也。”明确提出了“官为民师”的执政理念，这种理念在封建时代尤为可贵。他深入民间，体察民情。此外，他还主持修建了连州城下的“海阳湖”，疏通河道，灌溉农田，让连州百姓受益匪浅。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，将海阳湖改名为“刘公湖”，这份民心所向，正是对他傲骨精神的最好印证。

元和十四年，刘禹锡调任夔州刺史。夔州地处长江三峡，地势险要，民风剽悍，但他依然秉持着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的信念。他深入研究当地的民歌民谣，将夔州的竹枝词引入诗歌创作，写下了《竹枝词九首》，其中“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”一句，以双关语的形式，既描绘了三峡的自然风光，也表达了他对美好事物的追求，更暗含了他在政治上虽遭遇挫折，却依然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乐观心态。在夔州期间，他还写下了《浪淘沙九首》，其中“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”的诗句，成了他贬谪生涯的精神写照。这句诗不仅是对自己历经

磨难却依然坚守本心的慰藉，更是对保守派的无声反抗——无论你们如何打压，我终将会像金子一样，历经千淘万漉而愈发璀璨。

长庆四年，刘禹锡调任和州刺史。据《历代通纂》记载，和州知县见刘禹锡被贬多年，便故意刁难他，将他安排在城南的一间偏僻小屋居住。刘禹锡非但不生气，反而写下了《陋室铭》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可以调素琴，阅金经。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。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云亭。孔子云：何陋之有？”这篇不足百字的短文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名篇。文中，刘禹锡以诸葛亮的草庐、扬雄的子云亭自比，表明自己虽身处陋室，却有着高尚的品德与远大的志向。这种“安贫乐道、坚守气节”的人生态度，正是其傲骨精神的最高体现。如县见他如此豁达，又将他的住所迁至城北，房屋更加狭小，刘禹锡依然泰然处之，写下了《和州刺史厅壁记》，详细记载了和州的历史沿革与风土人情，为当地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。

三、重返长安，傲骨蕴通识

大和二年，刘禹锡终于结束了漫长的贬谪生涯，重返长安。此时的他，已经五十六岁，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沧桑的痕迹，但他的傲骨却丝毫不减，反而多了几分历经世事沉浮后的通透与从容。长安的宫墙依旧巍峨，朱雀大街依旧繁华，但刘禹锡的心境已然不同。他不再是当年那个锋芒毕露、急于求成的年轻书生，而是成为一位沉稳睿智、胸怀宽广的长者。他的傲骨，也从年轻时的剑拔弩张，转变为一种内敛而坚定的力量。

重返长安后，刘禹锡先后担任主客郎中、集贤殿学士、礼部尚书等职。虽然未能再次实现“永贞革新”那样的政治抱负，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为官之道，清正廉洁，直言敢谏。当时的晚唐，宦官专权愈演愈烈，藩镇割据日益严重，朝堂之上一片乌烟瘴气。刘禹锡在集贤殿任职期间，负责整理典籍。据《旧唐书·刘禹锡传》记载，他曾在朝堂上当面劝谏唐文宗：“陛下当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整饬吏治，严明法度，方能挽救危局。”言辞恳切，却也触怒了当时的权臣李德裕。李德裕多次在文宗面前诋毁刘禹锡，试图将他排挤出长安，但刘禹锡始终不为所动，依然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。

此时的刘禹锡，其傲骨更体现在对人生的通透理解与对文化传承的执着追求上。他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，看透了官场的尔虞我诈，却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。他在长安与白居易、元稹等诗人交往密切，时常聚会唱和，写下了大量的诗歌。他的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：“巴山楚水凄凉地，二十三年弃置身。怀旧空吟闻笛赋，到乡翻似烂柯人。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今日听君歌一曲，暂凭杯酒长精神。”这首诗是他与白居易在扬州相遇时所作，诗中既有对二十三年贬谪生涯的感慨，也有对世事变迁的豁达。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一句，以沉舟、病树自比，却不坠青云之志，反而以千帆竞发、万木争春的景象，展现了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与不屈不挠的傲骨精神。白居易读罢此诗，感慨道：“彭城刘梦得，诗豪者也。其锋森然，少敢当者。”这“诗豪”的美誉，正是对他傲骨精神的最佳注解。

在长安的最后岁月，刘禹锡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文化传承中。他整理编纂了自己的诗文集《刘梦得文集》，收录了诗作八百余篇、文章二百余篇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他还致力于经学研究，著有《论语源略》《五经钩沉》等著作，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与发挥。他在《天论》三篇中，提出了“天人交相胜，还相用”的哲学观点，批判了当时流行的“天人感应”神学思想，展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与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。这种精神，与他的傲骨一脉相承——不迷信权威，不盲从世俗，坚持真理，坚守本心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刘禹锡在重返长安后，再次游览了玄都观，写下了《再游玄都观》：“百亩庭中半是苔，桃花净尽菜花开。种桃道士归何处？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十四年前，他因《戏赠看花诸君子》被贬；十四年后，他故地重游，写下这首诗，既是对当年打压他的保守派的嘲讽——“你们这些‘种桃道士’早已不知所终，而我‘刘郎’却依然屹立不倒；也是对自己二十三年坚守的肯定。这首诗寥寥四句，却充满了胜利者的豪情与不屈的斗志，让那些曾经打压他的人颜面扫地。这种历经风雨而不改其志的坚韧，正是刘禹锡傲骨最动人的地方。

四、千年回响中的精神传承

刘禹锡的一生，与长安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长安是他理想的起点，是他傲骨的诞生地；而贬谪的岁月，则是他傲骨的淬炼场；重返长安后的岁月，是他傲骨的升华期。他的傲骨，是儒家“士可杀不可辱”的气节，是道家“顺应自然而不失本心”的通透，是中国文人精神的集中体现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长安早已不再是当年的帝都，但刘禹锡的傲骨精神却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，永远闪耀在中华文化的星空之中。他的诗歌，如“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”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“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”，之所以能够穿越千年依然震撼人心，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不屈不挠的傲骨精神。这种精神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，在面临困难与挫折时，坚守本心，勇往直前；在面对权贵与诱惑时，保持气节，不卑不亢。南宋末年的文天祥，在兵败被俘后，宁死不屈，写下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千古名句，其精神与刘禹锡的傲骨一脉相承；近代的朱自清，宁愿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，用生命诠释了“士可杀不可辱”的气节，同样是刘禹锡傲骨精神的延续。刘禹锡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傲骨，不是对现实的反抗，而是对理想的坚守；不是对他人的蔑视，而是对自我的超越。它是一种精神的力量，一种人格的魅力，一种能够跨越时空、永远照亮后人前行之路的光芒。他在贬谪途中，始终心系国家与人民，从未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；他在重返长安后，始终坚守自己的为官之道，从未向权贵低头；他的一生，都在践行着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的儒家信条，这种信条，正是他傲骨精神的根源。长安已矣，风骨永存。刘禹锡的傲骨精神，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，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依然需要这种傲骨精神——坚守真理，坚守正义，坚守人格的尊严；不随波逐流，不趋炎附势，不为名利所惑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，更加从容，才能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刘禹锡的传奇，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记忆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，它将永远激励我们，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，保持傲骨，砥砺前行。即便历经沧桑，依然不忘初心，这便是刘禹锡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。